

○ 漳州地方文献丛刊

泉漳集

葉國慶題

陈自强 著



國際華文出版社
INTERNA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 漳州地方文献丛刊 ●

泉漳集

葉國慶題

陈自强 著

漳州市历史学会 编
漳州市图书馆

國際華文出版社

INTERNA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漳集/陈自强著. - 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4. 12

ISBN 0-644-01132-7

I. 泉… II. 陈… III. 乡土历史-文化交流-研究-文集 IV. 544

国际华文版本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91 号

特约编审: 郑 镛 张大伟

责任编辑: 诗 焯

封面设计: 游海杰

书 名	泉漳集
作 者	陈自强
出版发行	国际华文出版社
印 刷	奔驰艺术印刷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84 千字
印 张	10.9375 印张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0-644-01132-7/K·15
定 价	RMB: 25.00 元 A\$: 16.00 元

地 址 (1800)悉尼艾士菲区邮局 1810 号信箱
中国联络 (361005)厦门市顶沃仔 12 号 067 信箱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漳州師範學院圖書館惠存

陳自強
贈
二〇〇三年三月

序

· 吴幼雄 · (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陈自强先生是福建省泉州市人,世居泉州城南德济门外海外贸易古街——聚宝街。其父陈盛明先生与家父为好友,同为两袖清风的泉州文化人,因此我们两家是世交。

先生在日常繁重的历史教学任务之余,既兼任漳州市民盟党派工作,还挤出宝贵时间进行闽南地方史研究,25年来成绩斐然。如今出版的《泉漳集》收录40多篇论文,仅是先生从事闽南文化史研究丰硕成果的一部分。

本书取名《泉漳集》,耐人寻味。先生出生于泉州,少时又住厦门,然40多年服务教育工作却是在漳州。先生的事业、家庭都在漳州,从这个角度看,说先生是漳州人也不为过。

《泉漳集》一书内容,包括泉州海外交通史、泉州回族史、赵宋南外宗正司史;漳州海上海外交通贸易史(特别是月港史);泉州漳州历史人物;厦、漳、泉的民间信仰;近现代反侵略战争和革命斗争史等几个方面。全书内容丰富,又有所侧重。在本书所收的40多篇文章中,以宋元泉州港和明代漳州月港为中心课题的闽南海外交通贸易史方面的文章占20多篇,这显示作者20多年的业余研究的主攻方向的学术水准。总之,本书是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高质量论文集。

先生为学态度科学严谨,写文章言必有据。必先据有大量史料,然后对杂芜材料进行梳理、过滤、考证,从不匆忙凭孤证亟下论断。所以先生每出文章,必有独到之处。又其文风言简意赅,生动活泼,因此我是最喜欢读先生文章的读者之一。记得1983年,

先生在《中国史研究》发表《“蒲寿庚宋末提举市舶三十年说”考辩》一文，以翔实的泉州地方史料（特别是九日山祈风石刻）为依据，在学术界首次论断蒲寿庚提举市舶仅“七个月”，而非传统说法“三十年”。文章仅三千多字，但这是对宋元鼎革之际重要人物蒲寿庚研究的一个突破。此后，其蒲氏家族研究屡有收获。

先生博学强识，慧眼识伪书。1999年以来，泉州史学界为英国人大卫·塞尔本“翻译”的《光明之城》一书所困扰，多数人认为此书记载了不为人知的珍贵的泉州中世纪史料，啧啧称赞，大加炒作。陈先生在仔细阅读《光明之城》后，写了篇随笔，对该书第四章、第五章关于宋季泉州社会“性解放”的内容进行分析，认定该书的记述是不可信的，是虚假的。虽是随笔，但体现了严肃的治学态度。

《泉漳集》付梓前夕，应先生的盛意，爰为之序。

2004年10月8日于泉州

序

· 郑 鏞 · (漳州市历史学会会长)

读陈自强先生的文章绝对是享受。敏感、生动、独创,他秉承家学,在长安山出入文学殿堂四年,博览群书,对中国古老而常新的学科——历史学情有独钟,浸润既久,终能积淀而成自己的内在资源,加上他那份自信和严谨,所以流于文字往往能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随感叙事,潇洒恣肆。我生而有幸,能有这么一位亦师亦友的同行,砥砺学问,一路论剑,其乐可知矣。

1982年岁杪,陈自强先生根据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的决定,精心策划和联络,促成召开了首次“漳州月港学术研讨会”。我以牛犊之气撰文参加,会后又与先生整理编辑论文集,历时数月,时有接触,高谈阔论,由专业讨论到人生体悟,风月无边,如坐春风,遂定交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廿余年我做些地方史的研究,写些很不成熟的文章,偶有“出采”处,很大成份上得益于先生的启发。挚友难得,一个真正的朋友需要“淡如水”的清澈,需要精神上的契合,也需要时间、需要历史,而历史是不能重复的,朋友亦复如是。如今,先生沉疴在身,惟精神旺健,双眼透露出的是对生死的坦然,对朋友的关爱和信任,真令我悲欣交集,欲说还休,惟默默祈求上苍,尽可能地延续先生的生命。

说到生命,中国传统学人最善于把握,即以自己的立言、立德做为生命的延续形式。陈自强先生的《泉漳集》亦可作如是观。本文集收录入40余篇论文,反映先生对闽南文化的关注和探讨,反映他的学术判断力和治学方法论。其中论及漳州地方史的二十余篇,均视角独到,文字清新流畅,尤其是漳州月港或称漳州港区的研究更

具功力。20世纪前期,国内外一些海交史学者曾关注过漳州月港在中国海交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该课题经近半个世纪的冷落后,80年代又被学界所重视,论著迭出,研究热潮方兴未艾。陈自强先生从中所起的鼓动、联络、组织作用当然功不可没。他以翔实、可靠资料为依据而下的论断几成为学界之共识——“16世纪至17世纪前期,漳州月港取代泉州港,成为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启航港,在我国海外交通史和国际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凭月港研究的成果,陈自强先生已让学界对漳州的文史研究刮目相看。论及漳州历史人物,先生也慧眼独具,知人论世,妙语纷呈,如陈元光、蔡襄、黄道周、蓝鼎元等,史论结合,评议得当。《芄江·芄城·丹霞》一文,以充分的史料严密的考辩,论证芄江是指北溪下游而非西溪,令人折服。

漳州市史学研究团体迟至1988年9月才告成立。成立伊始,陈自强先生即为领导成员,任秘书长、副会长,十数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热心会务,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多次有影响的学术活动,如“蓝鼎元学术讨论会”、“黄道周诞辰4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东山与台湾关系研讨会”等等;以及策划举办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鸦片战争15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同时,积极联络会员、不断完善学会的规章制度,为漳州市的史学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尽心尽力,贡献殊多。从文集的内容上也可反映出他的努力。做为生于泉州,长于厦门,谋生于漳州的“三栖”人物,陈自强先生穿梭于闽南三角,出入文史,甘当“厨师”,“煽风点火”、“热炒慢煎”,的确是闽南文化研究圈里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型学者。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学问之道,薪火相传。我道清贫寂寞,优良的学术传统,是此道中人所能拥有的极其重要的财富。我祈愿青山红叶能带来陈自强先生生命肌体的复苏,为我们写下更多、更好的学术论著。

二〇〇四年深秋于百里弦歌

目 录

序(吴幼雄)	1
序(郑 镛)	3

第一辑

1、李贽家世杂谈	1
2、论宋代泉州南外宗正司	7
3、“蒲寿庚宋末提举市舶三十年”说考辩	15
4、蒲寿崧史料考辨	19
5、蒲寿庚是否任过平章政事	29
6、论蒲寿庚家族对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贡献	31
7、泉州回族姓氏婚姻情况分析	48
8、略论明代的安海港	60
9、略论施琅治台方略之得失	67
10、刺桐·刺桐诗·刺桐港	73
11、性解放:雅各所展示的宋末泉州社会时尚	78

第二辑

1、略论明代中后期福建的对日交通	83
2、就《华夷变态》谈康熙年间海外交通贸易的若干情况	91
3、郑氏长崎存银诉讼案	109
4、《华夷变态》中的郑氏资料简介	117

第三辑

- 1、论明代漳州月港 121
- 2、略论明代漳州月港的历史地位 129
- 3、月港督饷制度述要 142
- 4、明代漳州月港续论 149
- 5、论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对月港海外贸易的影响 158
- 6、论明代以南澳岛为中心的漳潮海外贸易区 167
- 7、福建私新钱 177
- 8、明代漳州与琉球 180
- 9、漳州人与钓鱼岛 183
- 10、海外贸易商业资本的代言人 186
- 11、明代漳州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194
- 12、月港研究回顾与《漳州港》评介 199
- 13、郑和下西洋与漳州 212
- 14、华侨历史文献中的瑰宝
——程日焄《噶喇吧纪略》评介 226

第四辑

- 1、略论陈元光开漳之功与唐宋时期漳州的开发 233
- 2、蔡襄在漳州 239
- 3、谈漳州地区与俞大猷相关的碑刻、题记 242
- 4、略论黄道周 250
- 5、节义千秋 261
- 6、蓝鼎元的治台策略 267
- 7、芴江·芴城·丹霞 279
- 8、就泉、漳的差异性谈漳州名城的规划 284

第五辑

- 1、青礁士大夫与慈济宫 288
- 2、略谈泉州花桥宫及其善举 293
- 3、萧望之与西汉经学 298
- 4、闽台缘结泉郡富美宫
——闽台民间信仰互动关系的个案调查、分析 307

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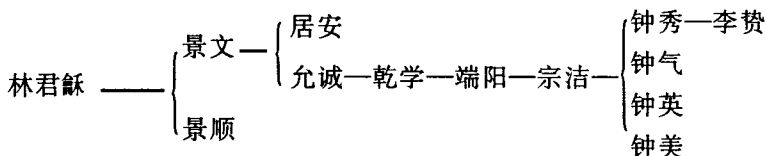
- 1、鸦片战争时期漳州军民的反侵略斗争 313
 - 2、略述陈金城的爱国思想 315
 - 3、略谈鸦片战争时期爱国士大夫的时代责任感 317
 - 4、“五四”狂飙席卷八闽 322
 - 5、陈嘉庚与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330
- 附录一：作者参与编辑的地方史论集书目 333
- 附录二：史学界对作者研究成果的介绍 334
- 作者后记 338

李贽家世杂谈

(一)李贽并非“出身于航海经商世家”

“明故处士章田李公暨配丁氏媵张氏合葬墓志铭”(以下简称《李章田墓志铭》)的发现,为研究李贽先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据墓志铭,章田系李贽的叔父,名廷桂,字钟气,生于正德七年(1512年),卒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比李贽大十五岁。《李章田墓志铭》立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当时李贽六十八岁,尚健在,虽客寓湖北麻城,但他的女儿、女婿都在泉郡。墓志铭系林奇材应李章田的儿子、李贽的堂弟载华、载盛之请撰书的。林奇材(1521-1601年),是李贽的族兄,嘉靖丙午科举人,己未中进士,官至广西平乐知府。据此,我们认为《李章田墓志铭》所记的李氏世系应该是可靠的,不会胡撰。现据《李章田墓志铭》所记,把李贽先世列表如下:



以前,有关李贽先世的文章,都把李贽视为林通衢(即林居安)的直系后裔,现应根据《李章田墓志铭》给予纠正:李贽不是林通衢的直系后裔,而是林通衢之弟允诚的直系后裔。《李章田墓志铭》有一处值得特别注意:“景文公生五子,长曰居安公,即奇材六世祖。”墓志铭的撰书者不忘自称是居安的后裔。若李贽也是居安的后裔,他们岂不是堂兄弟吗?哪一个堂

兄把自己的堂弟革出“堂”外之理呢？何况他又是在为李贽的叔父写墓志铭啦！因此，李贽是允诚的后裔，应该确信无疑。

既然李贽不是林通衢的后裔，而是允诚的后裔，那么，李贽“出身于航海经商世家”的说法也就应予否定了。

就一世、二世而言，李贽确有航海经商的先祖，但距离李贽已有数世之遥。据《清源林李宗谱·历年表》（以下简称《历年表》），李贽的三世祖允诚“从广齐移居南安胭脂巷，并改李姓”。看来，应当是从事务农。李贽的高祖乾学“复姓林”，似乎又迁回泉州，职业无从考证。曾祖端阳“复改李”，又迁往南安，“传为南安胭脂巷李派”，当系务农。从三世到五世，家境逐渐破落。李贽曾自述：“吾先曾大父大母歿五十年多矣，所以未归者，为贫不能求葬地。”到祖父竹轩（宗洁）时，生活已“贱贫”。李贽的父亲、叔父四人，虽然“自少长泊娶，同室共炊”，但“厥后食指蕃滋，庐舍湫阨”，因此“竹轩公命析箸分居”。李贽的父亲白斋（钟秀）是个书生，但连秀才也没有捞到，以教书为业，生活较困难，在李贽未当官时，得靠李章田“馈膳服劳”。综上所述，李贽先祖从三世起，并非从事航海经商。说李贽“出身于航海经商世家”，或“生于世代为商的家族”，是不妥当的。

（二）“载贽”并非“继承李廷贽”

李贽有位三世祖叔，叫李廷贽。而李贽初名又叫李载贽，隆庆元年因避穆宗朱载屋之讳，去掉“载”字。有的同志认为：“‘载’是再的意思，封建规矩子孙把父祖之名加上一个继承之意的字才可起为己名，那么‘载贽’就是‘继承李廷贽’的意思。”“很可能李贽与这个三世叔祖有继承关系，才起了这样的名字。”

我们认为，这个分析和推理，有些牵强，并为史料证明是错误的。

（1）据《历年表》所记，李廷贽派于天顺壬午年（1462年）

亦改姓李，“今为庵前李派”。子孙甚旺，衍为一派，为何特地要李贽继承呢？其实，李贽与李廷贽相隔五世，也绝无承继之理。

(2)据《李章田墓志铭》，李贽的两个堂弟一曰载华，一曰载盛，与李贽的初名一样，第一个字都是“载”字。这说明，李载贽的“载”字并非含有继承何人的意思。这当然也不是有意要触犯封建规矩，只能视为偶然的巧合，不必做“继承关系”的文章。

(三)李贽先世本姓是“李”而非“林”

九世同坟，历代明裡先俎豆；

一宗两姓，熙朝文物夸李林。

据说，这是李贽青年时代为一世祖林间所作的一对华表。这对华表点出了其家族姓氏的特点：“一宗两姓”。李贽先世本姓是“李”还是“林”，历来有分歧。我们认为，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君稣“以林著姓”到底是本姓还是改姓？《明陆凉州知州封奉政大夫觉石李公墓志铭》为弄清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公讳应先，字登甫，号觉石。系出河南固始，唐刺史(李)弘弼公入泉，其后从外姓为林，至广齐公复姓李。”这里，“其后从外姓为林”之“其后”指谁呢？据有关宗谱记载：君稣之妻姓钱，他的儿子景文、景顺当然无“从外姓为林”之事。这样，“从外姓为林”的就只能是君稣了。也就是说，君稣“以林著姓”系为改姓，而非本姓。

有关宗谱和墓志铭均记载：李氏先世为陇西人，原籍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人，为唐李弘弼之后裔。李贽在《焚书·与焦弱侯书》中也认为其先世为“光州固始人氏”。这些都说明，“李”为本姓，“林”为改姓。那种认为李姓只不过是李广齐为替自己改姓找根据而攀引李弘弼为始祖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四)关于林李分宗的原因

“一宗两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始祖第一世派分

林李”。即从二世景文、景顺起，就出现林李之分：景文依然姓林，而景顺及其子广复改李姓。(2)景文之后裔也分为林派和李派两大支系。这点，在上文从李贽并非出身于“航海经商世家”一节已经论述了。第一方面是主，第二方面是从。因此，要弄清林李分宗的原因，关键在于搞清楚景顺、广齐父子为什么要移居南安，复改李姓。

有人据《历年表》所记，认为：“老二房三世祖李广齐因得罪姓徐的御史，被加上谋反罪名，为避祸计”而“逃南安开始改姓李”。这种分析，我们不能同意。

据《历年表》，李广齐构祸“始于上塘倡建岳帝庙，立下马碑”。——上塘，又称“尚塘”，当时属南安县归化里，今属南安县城关公社。据晋江地区李贽文物资料调查组调查，李广齐当年所建的岳帝庙犹存。请问，若未迁居上塘，怎么会于上塘倡建岳帝庙而构祸呢？显然，迁于上塘在前，构祸在后，绝非什么“为避祸计”才迁往南安，复改李姓的。据《故李母黄氏墓志铭》：李广齐迁居上塘的时间是永乐辛卯年(1411年)。虽然与宗谱及其他碑刻的记载不同，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它却雄辩地证明：构祸确实在迁居以后。

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从宗教信仰的分歧来分析林李分宗的原因。

元代封建统治阶级分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压迫(其实质乃是阶级压迫)。色目人指西域诸族，其官僚贵族的地位仅次于蒙古的官僚贵族。“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福建为色目人之渊藪，泉州更为其巢穴，势力炽盛。如元初之蒲寿庚曾逞威闽中；元末之赛甫丁、阿迷里丁、那兀纳等曾先后据泉，涂炭泉州。当“元纲解纽，戎丑据泉”之时，林君稣却安然无恙：“戎丑虽暴，敬公之德，不敢有犯焉。”这大概由于他“尝以客航泛海外诸国”，与色目人有着密切关系所致。明朝建立后，封建统治者则采取

排斥异族的政策，色目贵族威势倾复，信仰异教或与色目人有着密切关系的汉人也难免遭忌。但在这种情况下，君稣之长子景文（林駑）竟然在“奉命发航西洋”时，“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并“娶色目人，遂习其俗”。这怎能不激怒正统观念浓厚，不信回教的弟弟呢？怎能不引起兄弟间的冲突呢？属于李端、李广齐派下的宗谱——《荣山李氏族谱》，竟然因为景文之子孙“犹不去其异教”而“乃不悉书之”。这本族谱还特地记载了李广齐（族谱写成为“李广斋”）的《垂戒论》。《垂戒论》不仅谴责元末据泉之色目人“大肆凌暴，以涂我生灵”，并且谴责那些“从妻为色目人者”，“从母为色目人者”，“焚乱我族类，蔑视我常宪，欺哄我彝伦”，甚至直捷了当地谴责“伯父为衣冠缙绅之裔，迷于色目之俗而不能悟”。《荣山李氏族谱》站在李派立场上的这种严峻态度，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给兄弟间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带来的深刻分歧。“肇分林李之派，其隙亦开于此矣”！

总之，李端、李广齐父子是因与李端宗教信仰分歧，而迁居南安，并复改李姓的。但这种分歧，与一般的宗教信仰的分歧又不同，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政治背景。

（五）李贄故居存疑

泉州南门万寿路 159 号，确实是李贄故居吗？随着李贄先世的新史料的发现，我们不能不提出这个疑问。

《历年表》所记有关万寿路 159 号的资料，很清楚地证明：此间住宅为长房林派所有。它为林派三世祖林通衢所创建，直到嘉靖年间被倭寇烧焚，一直为林家所有；后改为“林氏宗祠”，直到清康熙年间才为“林李宗祠”。

以前，因为把李贄划进老长房林派，视他为林通衢的直系后裔，而推知“李贄生于此屋”，为“李贄故居”。

现在，随着《李章田墓志铭》的发现，已否定了李贄属于老长房林派的旧说法。所以，不能不对今天“李贄故居”的真

实性提出怀疑。

《历年表》记：万历壬午(1582年)，“我封公筑祖居中厅，颇成规模，会魁丰瀛叔到视，直肯之，盖叔平生极重堪舆家言。”丰瀛，即林奇材。由此看来，不是李贽，而是他的同时代人、族兄、《李章田墓志铭》的撰书者林奇材，才是此间住宅的主人。论故居，当为林奇材的故居，而非李贽的故居。

如果万寿路159号不是李贽故居，那么李贽故居当在何处？至今，尚缺确切的资料，我们不敢妄断。从一些迹象来看，有可能在今泉州胭脂巷。但这仅仅是猜测而已。

(载《泉州文史》第一期,1979年7月出版)